

张立文 / 著

ZHANGLIWEN

朱熹评传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ZHUXI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南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其思想成为中国元代以后官方意识形态，并成为朝鲜李朝和日本江户时期的官学。本书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以理气为核心范畴而展开经济、政治、哲学、自然科学、教育以及美学、伦理学、历史观等方面的思想，分析其内在的思想逻辑结构，诠释其思想致广大、尽精微之所在，肯定其在中国思想史和朝鲜、日本思想史上的地位。

本书凝聚了作者三十五年研究朱熹思想的心血和成果，是目前国内论述朱熹思想最全面最深刻的著作之一。

長 春 出 版 社

张立文 / 著

ZHANGLIWEN

朱熹评传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ZHUXI

長 春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朱熹评传/张立文著.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5445—0506—2

I. 朱... II. 张... III. 朱熹 (1130~1200) —评传 IV. B24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0659 号

朱熹评传

著 者: 张立文

责任编辑: 张中良

封面设计: 王国攀

出版发行: **长春出版社**

总编室电话: 0431—88563443

发行部电话: 0431—88561180

读者服务部电话: 0431—88561177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 130061

网 址: www.cccbs.net

制 版: 长春国栋文化传播中心

印 刷: 长春新世纪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463 千字

印 张: 24.25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册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431—84667159



张立文 男,1935年生,浙江温州人。195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革命史专业,1960年毕业留校,分配在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任教。1984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批为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和合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周易研究会副会长。

主要科研领域: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传统学引论》、《新人学导论》、《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人道篇)、《中国近代新学的展开》、《周易与儒道墨》、《周易帛书注译》、《宋明理学研究》、《宋明理学逻辑结构的演化》、《朱熹思想研究》、《朱熹评传》、《走向心学之路》、《朱熹与退溪思想比较研究》、《退溪哲学入门》、《李退溪思想研究》、《戴震》、《船山哲学》、《和合与东亚意识》、《中国和合文化导论》等。主编、合著:《道》、《理》、《气》、《心》、《性》、《天》、《变》、《中外儒学比较研究》等四十多部。多次获北京市、教育部、国家社科优秀成果奖,并获退溪学国际学术奖。被收入国内各种名人录及英国剑桥、美国、印度名人录。

出版说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图书出版界迎来了百花争艳的春天,出版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出版物,其中有很多是文化精品。有许多学术著作,经过读者的广泛传告,吸引了—个庞大的阅读群体,成为当代的学术名著。因为它们或是中国老一辈学者的毕生心血,或是十年磨—剑的作品,是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可恒久流传的图书。时间过去一二十年了,这些图书在市面上已经基本见不到了。在阅读愈益深刻的今天,修订出版—批这样高品位的学术著作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朱熹评传》就是这样的一本书。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张立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周易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儒联常务理事,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兼学术委员,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国哲学史家。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南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其思想成为中国元代以后官方意识形态,并成为朝鲜李朝和日本江户时期的官学。本书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以理气为核心范畴而展开经济、政治、哲学、自然科学、教育以及美学、伦理学、历史观等方面的思想,分析其内在的思想逻辑结构,诠释其思想致广大、尽精微之所在,肯定其在中国思想史和朝鲜、日本思想史上的地位。

本书凝聚了作者 35 年来研究朱熹思想的心血和成果,是目前国内论述朱熹思想最全面最深刻的著作之一。

本书在 1998 年出版后,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很多大学把它作为研究生的教材或必读书。

本书原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社在此基础上,全面进行了修订,开本由原来的 32 开,变为 16 开。

我们希望该书的重版,对于文科大学生、文化工作者、哲学爱好者、研究者会大有裨益,它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长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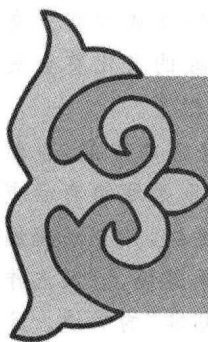
2007 年 11 月

朱

喜

评

传



自序

我研究朱熹思想 35 年有余,其间有神交的愉悦,有遭害的悲愤,亦有闪光的启迪,有精神的激励。这是我之所以持续不断和朱熹思想结缘的原因所在。

由于朱熹思想体现了历史的脉搏、时代的精神,因此,他的思想适应了社会的需要,影响久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成功地回应了当时社会各个方面的挑战,并化解了各层面的冲突。这些冲突和挑战表现为:

一是价值理想的挑战。唐末的藩镇割据,黄巢起义,以及五代十国的长期混战,造成了社会长期动乱和分裂,致使伦常破坏,道德沦丧,理想失落,精神迷惑。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加强社会凝聚力。宋代道学家必须重整伦理纲常,道德规范,重建价值理想,精神家园。朱熹所建构的“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道德形上学的哲学逻辑结构,担当起重整和重建的责任,并较切实地化解了这一挑战。

二是外来文明的挑战。自汉以来,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社会心理、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发生激烈冲突,虽有“三武灭佛”运动,但不能从思想上清除佛教信仰。佛教思辨的哲学较之儒教精致。同时道教在吸收佛教思想中,亦使其宇宙化生理论更为完善,而出现儒衰佛盛的状况。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教受到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的挑战。如何把儒、释、道三教思想在冲突中融合起来,以达到“一道德”的需要,是当时学术思想界所追求的。从隋唐提出对三教实行兼容并蓄的政策以来,一直延续到宋初,并没有把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起来。虽然宋初的孙复、李觏等继承韩愈的批佛、道,兴儒学的精神,提出佛存有十害,去佛有十利的主张,但既不能去佛,又不能去害。程颢提出“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①。天理二字虽古已有之,然“自家体贴出来”是指创造了融

^① 《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二程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424 页。

儒、释、道三教为一的理学体系,开创了理学的时代;并把兼容并蓄儒、释、道三教的文化整合方法落到了实处。对外来印度佛教文化的挑战作出了成功的回应。中国传统文化在融合儒、释、道三教文化中,不仅达到了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高峰,而且超越国界,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并在与该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中,而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由张载、二程奠基的理学,由朱熹集大成,使儒、释、道三教的文化整合更加完善起来。此后三教的冲突在思想哲学领域就不如唐和宋初激烈了。

三是理论形态转型的挑战。宋代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自然科学三大发明的完善,促进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城镇商品市场的发达,酝酿着理论形态的转型。但这个转型受到传统经学的挑战,并与汉唐经学发生严重冲突。汉儒治经,偏重注解,名物训诂。唐儒治经,上承汉儒,依汉注作疏。《五经正义》以“疏不破注”为原则。末流所及,以致“讳言服、郑非”的情境。不仅以“疑经”为背道,而且以“破注”为非法,严重桎梏、束缚着思想界。宋儒起来大破汉唐“传注”,打破疑经、破注的禁锢,不仅“舍传求经”,而且“疑经改经”,松动了压在思想上的重重大山,实行了由训诂之学向义理之学的转变,朱熹以《周易》为卜筮之书,《诗经》讲男女之事,《尚书》为历史文献记录等等,扫除了《五经》为圣人之言的种种光环和权威,实现了思想解放,出现了中国思想史上罕见的各家异说,学派众多,争奇斗艳的繁荣格局,才使隋唐儒、释、道三家之学向宋明理学的理论形态转型。

宋明理学在回应、化解上述三方面的挑战和冲突中,凸显了其生命智慧和活力。西方学者曾将宋明理学称为新儒学(New-Confucianism),有其道理。跟元典儒学和汉唐经学儒学相对照,宋明理学确有新的特点,新的精神。宋明理学之所以为新儒学,是指其在外来印度佛教文化哲学与本土道教文化哲学以及价值理想、理论形态转型的挑战下,将元典儒学作为滞留于伦理道德层次的心性之学,从形上学本体论层次给以观照,使传统儒学以心性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和价值理想(包括社会理想 and 人格理想)建构在具有理性力度的形上学本体论思维之上,通过诠释心性与本体、伦理与天道的联结以及人与生存世界、意义世界、可能世界的关系,使儒家道德学说获得形上性和整体性的阐发,传统儒学内部的逻辑结构、价值结构、道德结构等经此调整,获得了新的生命。

宋明理学新儒学之新,是通过一系列活的、有重要文化历史价值的学术精神充分而生动地开显出来的。宋明理学的精神,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整体体现。朱熹思想无疑是这种民族精神的体现,也是当时时代精神的精华。

其一,求理精神。宋明理学,特别是程朱理学,具有理性主义的特性。宋明理学最切近的学术目标,是要“格物穷理”。《续资治通鉴》卷一五五中说:“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这个理既是形上学本体,是普遍的存有根据,也是最深层的价值源泉。程朱理学是一种寻根究底的理性主义哲学,

求理精神是其最基本的学术精神。这种求理精神是宋明时期社会文化思潮和民族时代精神的显著标志。它体现了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生存方式和文化核心,以及由这种生存方式和文化核心所转化的自觉生存智慧和价值观念。在朱熹的思想观念中,理是事物之“所以然”和行为之“所当然”的合体,是先验的价值原则和经验的条理秩序的统摄融贯。对此理的“格致”和穷究,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在理性原则的指导下从事德行实践,通过道德主体的自觉操持,实现万物存有的价值及人生的意义。他们把理的精神或原则推及一切领域,自然、社会和人生都被召唤到理的天平下,被追究其“所以然”与“所当然”,被判断为合理抑或不合理,以至被决定其存在与否的命运,使儒学理性精神发展到一个极限,体现了理学的根本特征。

胡适曾说,朱子的学说有两个方面:这就是“程子说的‘涵养须用主敬,进学则在致知。’主敬的方面是沿袭着道家养神及佛家明心的路子下来的,是完全向内的工夫。致知的方面是要‘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科学家穷理精神,这真是程朱一派的特别贡献”^①。此说有其道理。涵养重“尊德性”,进学重“道问学”,是二而一的两种功夫。穷理精神可转换为现代对科学的追根究底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求理精神。

其二,主体精神。她是以中华民族现实生存为根基的文化群体主体精神。她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关心的是文化“道统”的生生不息,向往的是“廓然大公”、人人圣贤的至德之境。理学家借助理欲、心性、理气等对偶范畴的精致辨析,将人的道德存在、伦理特性和价值尊严提升到了宇宙本体的形上学高度,视人为天地万物的价值主体,抽象地证实了“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儒学信念。

古代中国社会,是以农业为主的宗法社会。人们必须按照天地变化、四时运行的自然法则制定节气,依据节气安排耕作活动。自然环境的变化,既带来风调雨顺的丰收喜悦,使人普天同庆;又可导致干旱水涝等大面积的灾害,让人万众齐哀。怎样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天人合一状态,成了传统文化哲学的首要课题。与此同时,如何协调人伦关系,规范宗法秩序,强化群体意识,提高群体智慧和力量以对付各种灾害,达成人人融突而和合,也成为传统文化哲学的基本问题。宋明理学的主体精神,深深地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这一生存环境及其文化价值理想之中。朱熹以天下为己任,以天地为己心的情怀,正是理学文化主体精神的体现。

其三,忧患精神。程朱的忧患精神是指人处于忧患境遇时,对人性的伟大与尊严以及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意义与价值的深刻体验,并力争通过人自身的生命力量超越忧患境遇,达到真善美高度和合的文化心态。宋初面对唐末五代的情境,道德文化与学术思想的当务之急,是重新建构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重新确立儒家伦理规范和道德原则。朱熹怀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积

^① 《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载《读书杂志》第17期,1924年1月6日。

极参加社会政治经济改革。“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无限责任意识与使命意识，以及由自我心灵发出的无限的爱人及物、由己及人的悲愿，同时对于未来社会亦充满忧患，从而把自我美好愿望提升为现实的社会理想。

自觉而深沉的忧患精神，煎熬与锤炼了朱熹的思想意识，驱动他不断超越所处的时代，从形上学本体论的思维高度反思人伦的存在价值、文化的生命意蕴和道德永恒力量，迫使其打破学术的派别门户之见，出入佛老，游思空无，综罗百代，融合三教。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终于使以儒家伦理为代表的民族文化展示出崭新的形上姿态。

其四，力行精神。她是朱熹入世的品格和刚健精神的凸显，是其投身现实社会，奋发进取，追求自己理想价值实现的精神的体现。朱熹既强调知的先行性，主张“知先行后”，又重视行的重要性，坚持“行重知轻”。只要沿着“格物穷理”的格致路线走下去，就必定能达到知行一如的德行境地。这无疑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渐修之路，需要“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的持续积累，才能“脱然自有贯通处”。但随着程朱理学的官方化，理学末流视理学为猎取功名利禄的工具，便失却了“格物穷理”的力行精神。

其五，求实精神。程朱理学出入佛老，既吸收佛道思想精华，而又批判佛教之空与道教之虚、老庄之无为其学术宗旨。朱熹曾反复申明：“释氏虚，吾儒实”。“要之，佛氏偏处只是虚其理，理是实理，他却虚了，故于大本不立也”。他讲实学，求实功，针砭时弊，颇有建树。任何精密的理论因教条化而流于空谈，是学术发展中具有普遍性的蜕变倾向，实非朱熹理学所独有。其实，区分学术思想空谈与非空谈的标准，不能是简单而直接的功利效果。从表现形式上看，任何理论性的学术研究和思想争论都有务虚的，似乎是无实无用的空谈。但是学术思想的实，是反映客观现实的理论之实；学术争论之用，是推动思维发展的逻辑之用。因而，程朱理学有其谈论心性，辨析义理，旨在重建社会道德价值理想和伦理生活秩序，因而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实学，是有逻辑概括性的实理的一面。不仅“实理”范畴是由程朱等首先阐明的，而且“实学”这一概念的理论含义，也是由程朱等反复倡导的。实学就是没有“议论辞说之累”的学问，即实实在在的学问，其实即是“明道”之学。讲实学，求实理，是贯彻于理学思潮始终的求实精神的体现。

其六，道德精神。重伦理，尚德行，是程朱理学道德精神的重要特征。相对于倏忽即逝的现象，朱熹更注重恒常不变的本质。他用理来说明物之为物，人之为人的内在根据和终极原因，并论证人的心性本体及其道德价值的形上性和永恒性。在功利与理想、利益与公德、公与私的冲突中，拔高理想、道德和公的地位，主张以公灭私，以理统欲。他们将儒家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抽象化、本体化，使其成为“颠扑不破”的价值原则；同时，又依据这些理想化的原则处理实际的人伦关系，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修养准则。这一主张，有禁欲色彩。但若将其视为

完全禁欲主义而加以否定,又过于偏颇。这里需要弄清:理欲之间怎样划界?存理灭欲的实际所指为何?朱熹曾以饮食之道为例,说明理欲分际:“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可见其并不一概否定饮食男女之类的人生基本需要,存理灭欲的实际所指是奢侈无度的少数官吏,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出现事与愿违的背反。理欲之辩的初衷是想规谏统治者,使统治者心术端正,以利于社会和谐和道德教化。但事实却是统治者顺手接过来,使理欲之辩由道德修养性的圣贤功夫转化成了政治奴役性的残杀工具。

朱熹的道德精神,具有形上学品格的理想境界的意蕴,只要重建了儒家伦理价值体系,就能从心性这一本根上匡正唐末五代以来的道德沦丧情境,使社会伦理复归于三代“天理流行”的至善境界。

其七,开放精神。朱熹哲学不仅敞开心胸,吸收儒、释、道各家之长,为我所用。如佛老思想中有价值的理论学说,思维方法和逻辑结构图式,表现出极大的兼容心态和开放精神。他既能“综罗百代”之学术,若无开放精神是根本不能“综罗”的。正因为他有开放精神,所以能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

随着历史的发展,朱熹思想所赖以产生的时代背景业已消失,其具体学术主张和思想观点也多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和价值。但是蕴涵在这一思想中的求理、求实、主体、忧患、力行、道德、开放等活生生的学术精神,仍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民族文化的传统之中,生长在民族心理的结构之上。朱熹道学和宋明理学所体现的这些精神,若与中国现实国情及世界发展趋势相结合,对其进行体认和创新,是意义深远的学术文化使命。

朱熹思想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现象,如何现代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应如何解释?笔者认为,所谓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实质上是文化精神的转生问题,而不是某种文化形态(如儒家的现代化,道家的现代化,或接着宋明理学讲等)或静态的传统文化(生成物)在现代是否有存在价值的问题。文化精神的转生,就是与现代社会的接轨,渗透到现代社会生活之中,并为现代社会生活所需要,这便是传统文化精神转生为现代文化精神。

张立文

1997.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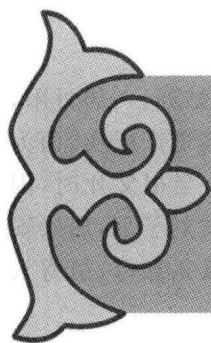


目 录

出版说明	1
自 序	3
第一章 由禅返儒,集成理学	1
一、求学参禅为官	1
二、集理学之大成	9
三、名列伪学逆党	18
四、著作年代考释	23
第二章 重农开源,井田货币	27
一、贫富获取合道	27
二、民生之本在农	29
三、薄取俭奢适中	34
四、赋税节用赈济	37
五、务本节用,足国之道	42
六、货币流通轻重	44
七、井田以正经界	47
第三章 天理君权,德刑人材	52
一、号令刑罚相辅	52
二、天理君权理念	54
三、集权分权关系	56
四、为政德刑相兼	63

五、任贤使能治国	70
第四章 理气道器,分殊流行	77
一、哲学逻辑结构	77
二、形上学之追究	80
三、理气道器体用	94
四、气器阴阳功能	103
五、理一分殊圆融	114
第五章 宇宙天文,气象自然	123
一、宇宙结构演化	123
二、天体运行历法	128
三、气象阴阳潮汐	134
四、实理实学实验	139
第六章 形神魂魄,鬼神屈伸	142
一、形体神知阴阳	142
二、灵魂体魄关系	144
三、鬼神实然之理	150
第七章 象数义理,变易交易	156
一、象数义理兼综	156
二、变易交易会通	161
三、河洛奇偶生克	166
第八章 一二动静,变化中庸	174
一、一而二,二而一	174
二、动静对待融合	181
三、渐化顿变新生	186
四、中庸无过不及	191
第九章 格致心思,持敬知行	200
一、格致体验天理	200
二、积累豁然贯通	208
三、知觉心思虑意	213
四、主体持敬去欲	222
五、知行先后互发	226
第十章 心性情才,天地气质	233
一、人性物性异同	233
二、天地气质之性	240
三、心性、道心、人心	250

四、性、情、才统于心	257
第十一章 美善文道,诗理自然	264
一、善信美大圣神	264
二、文道合一要旨	269
三、诗理不离诗教	275
四、平淡自然规模	279
第十二章 理欲义利,三纲五常	285
一、天理人欲关系	286
二、义利道德价值	292
三、三纲五常名教	296
第十三章 心术王霸,元会道统	305
一、帝之心为大本	305
二、王道霸道之治	307
三、元会运世循环	309
四、继往圣之道统	310
第十四章 经史次第,春秋正统	314
一、史学对象范围	314
二、取舍评价标准	316
三、先经后史次第	319
四、明正统,法《春秋》	321
五、效法与不可法	324
第十五章 人伦教育,小学大学	326
一、明人伦的目标	326
二、小学大学教育	331
三、教学方法探索	335
四、精思涵泳体察	337
第十六章 朝日官学,独尊朱子	343
一、立万世之规范	343
二、官方意识形态	347
三、朝鲜、日本官学	353
后 记	371



第一章

由禅返儒，集成理学

朱熹是继孔子之后的大儒之一，他的思想被尊称为“朱子学”。他的学说不仅使儒学理学^①在宋以后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并处独尊地位，而且影响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曾一度成为这些国家的官方哲学或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并得到他们的推崇和信奉。朱子学超越国界而走向世界。

一、求学参禅为官

朱熹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后字元晦，又改为仲晦，号晦庵，60岁后称晦翁，晚号迳翁，又号云谷老人、沧州病叟^②等。祖籍婺源（古属安徽徽州，今属江西婺源县）松岩里。他出生在福建南剑（今福建南平）尤溪县城外毓秀峰下郑氏馆舍，生于南宋高宗赵构建炎四年（1130），卒于南宋宁宗赵扩庆元六年（1200）。

根据朱熹门人黄榦在《朱子行状》中记载，朱熹的家世为“婺源著姓，以儒名家”，但《宋史·朱熹传》不载。清人王懋竑在作《朱子年谱》时，则采此说。因此，在《婺源县志·朱子世家》中这样写道：

唐末有朱古寮者，仕为婺源镇将，因家焉。历传至森，以子赠承事郎。森

① 中国儒学经四期，孔孟为元典儒学，两汉为经学儒学，宋明为理学儒学，近代以来为新学儒学。

② 见《宋史·朱熹传》；《朱子世家》，《婺源县志》卷十八；王懋竑：《朱子年谱》；《宋人轶事汇编》下册《茶余客话》。

生松，字乔年，号韦斋，官吏部。年踰冠以上舍登第，授建州政和尉。父卒，贫不能归，因葬承事于政和。服除，调剑州尤溪尉，……御史中丞同荐公可任大事，复召对言至切。迁著作郎，尚书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历司勋吏部两曹兼领史职如故。转奉议郎，又转承议郎^①。

因朱熹祖辈出自“吴郡朱氏”一支，汉灵帝时此支由青州过江，一居姑苏，一居丹阳，朱熹先祖属丹阳一支。朱古寮始迁居婺源，为婺源朱氏之祖。由其资产殷实，而为“望族著姓”。到了朱熹的祖父朱森、父亲朱松时，家境已经衰落。当祖父死时，因贫而不能扶灵归葬婺源故里。朱熹父亲朱松死时，把家事托与其友刘子羽，居崇安县五夫里，受父命而受学于胡宪、刘勉之、刘子翬。朱熹与母亲，孤儿寡母，虽寄人篱下，精神压抑，但生活上仍过得去，可专心读书求学。

兹依朱熹的事业和求道的心路历程，可将他的生平活动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高宗建炎四年(1130)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是朱熹的青少年时期，从事学习、参加科举考试和初政，以及思想活跃阶段；第二个时期，从绍兴三十二年(1162)到光宗绍熙五年(1194)是他中年到晚年的时期，是他参政、讲学授徒，著书立说，集理学之大成阶段；从绍熙五年七月宁宗即位到庆元六年(1200)是朱熹晚年，学术达到更高境界，亦是道学遭禁的阶段。

(一)少年丧父，留心禅学

朱熹出生的那一年，既爆发了钟相领导的农民军起义，又遭金兵进攻杭州之难。秦桧受金派遣^②，回到宋廷。寓居在尤溪的朱松为避范汝为农民军，举家逃

^① 《朱子世家》，《婺源县志》卷十八，清乾隆甲戌(1754)本；民国《重修婺源县志》，《朱子世家》为第二十卷。《婺源茶院朱氏世谱》，《录曾祖父作诗后序》，《韦斋集》卷十。

^② “初，桧从二帝至燕，金主以桧赐挾懒(金军事首脑)，为其任用，挾懒信之。及南侵，以为参谋军事，又以为随军转运使。”(《秦桧主和》，《宋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二)。1127年，秦桧被金军俘虏后，曾替赵佶上书女真贵族统治者，建议派一宋臣去说赵构屈膝称藩，秦桧表示愿意担任这个角色，取得了金奴隶主贵族的信任。1129年，秦桧充当挾懒的军事参议，随挾懒到淮东。金攻楚州，不能破，秦桧代挾懒作檄文，劝说楚州军民投降。由于秦桧投敌有功，所以女真贵族挑选他为内奸，派到南宋。可是秦桧却掩盖了自己投敌的罪行，“自言杀金人监己者，夺舟而来。”(同上)当时很多人对于秦桧的谎言就有怀疑：“朝士多疑其与何榘、孙傅等同被拘执，而桧独还；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蹈河越海，岂无讥诃之者，安得杀监而南。就令从军挾懒，金人纵之，必质妻属，安得与王氏偕。惟范宗尹及李回二人素与(秦)桧善，尽破众疑，力荐其忠。桧入对，首奏所草与挾懒求和书。帝谓辅臣曰：‘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闻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先是，朝廷虽数遣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专意与敌解仇息兵，则自桧始。”(《宋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35~736页)

难。朱熹两岁时，秦桧取得高宗赵构的信任，进行投降活动。三岁时，范汝为兵败，朱松重回尤溪。

朱熹从小就很聪明，四岁时，朱松指天而讲，这是“天也”，朱熹问：“天之上何物？”这种追根究底的发问，使朱松很惊异。而这个曾困扰无数哲人的，天现象背后是什么的问题，确是超越四岁孩子颖悟的水平。五岁时又为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而烦恼，思考天地四边有无尽处，尽处是什么等问题。这年朱熹入小学。六岁时曾与一群儿童在沙地戏嬉，他独自端坐，以手指画沙，画的是八卦^①，又引起人们的惊奇。

绍兴七年(1137)朱熹八岁就傅，开始正规的六经训蒙教育。他“厉志圣贤之学”，慨然奋发，读《孝经》，而题字“不若是，非人也”。每日读《论语》、《孟子》等无间断。当读《孟子》时，他深有感触地说：“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②他从人人皆可为尧舜的意义上体会“圣人与我同类”，于是，他以做圣人为自己的理想目标。

朱松由于长子和次子早夭，他把希望都寄托到朱熹身上，他到临安做官时，曾带朱熹到临安，使朱熹耳濡目染道学先辈如尹焞等。“熹儿时侍先君子官中秘书，是时和静先生实为少监，熹尝于众中望见其道德之容，又得其书而抄之”^③。王德修为尹焞弟子，朱熹手抄尹焞的《论语解》，由此而发，遍读二程门人的书，为他后来写《论语详说》打下基础。

绍兴八年(1138)金派使至临安签订和约，朝野反对。枢密院编修官胡铨等反对最烈，乞斩秦桧。结果胡铨遭“昭州编管，永不叙用”的命运，朱松与胡珪、张扩等联名上书，主张抗金，反对乞和，赵构和秦桧一意孤行，朱松被排斥出朝，出知饶州。

绍兴十年(1140)朱熹结束了在临安的读书生活和父亲回到福建建瓯。但国家的耻辱，父亲的被贬，在他的幼小心灵留下不可抹去的影响。直至朱熹死前一年，他回忆说：“尝记年十岁时，先君慨然顾语熹曰：‘太祖受命，至今百八十年矣。’叹息久之。铭佩先训，于今甲子又复一周，而衰病零落，终无以少塞臣子之责，因和此诗，并记其语，以示儿辈，为之尽然感涕云。”^④虽经60年，但北伐无望，朱熹仍哀叹不已。

这年朱熹十一岁，便在父亲严格的教育下经历“十年寂寞抱遗经”的生活，不仅苦读，而且教以如何做人的道理。可是这种庭训的时间并不长，绍兴十三年

① 《朱熹传》，《宋史》卷四二九。

② 《朱子语类》卷一〇四。

③ 《答王德修》，《朱熹集》卷五十五，郭齐、尹波点校，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807~2808页。

④ 《蒙恩许遂休致陈昭远丈以诗见贺已和答之复赋一首》，《朱熹集》卷九，第400页。